



群星闪耀延河边

—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

天蓝

到延安前

天蓝1912年8月10日出生于江西南昌王家村，早年在家乡读私塾。1926年考入南昌心远中学，同年秋发表处女作旧体诗《西山扫墓》。1929年初中毕业后，考入上海高中理科，组织学生文学社团黄蔷薇社。1930年春因参加反法西斯活动被开除，随即转入上海光华中学，继续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协助编辑学生会会刊。1932年秋考入浙江大学外文系和哲学系学习。后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和抗日民众先锋队等组织。1932年开始用笔名白木在上海发表新诗《一个苍蝇的自杀》等。曾多次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而转学，最后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外国文学系。在北平期间，主编进步文化刊物《大学文艺》，编辑左联机关刊物《烽火》《联合文学》等，任北平作家协会常委，负责出版部工作。1935年参加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十个学生支队的支队长之一。天蓝还是“七月”诗派著名诗人之一。

1937年抗战爆发后，经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介绍，天蓝至黄河八路军军防区，在山西洪洞县八路军总司令部任秘书、翻译及《前线》杂志

人物介绍

天蓝(1912—1984)，原名王名衡，又名王若海，曾用名白木。江西南昌人。作家、诗人、文学翻译家。著有诗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像太阳般升起》《队长骑马去了》《预言》，歌剧剧本《军民进行曲》(合作)，歌曲《九一八合唱》(合作)《开荒》(合作)等，译著《演剧教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文艺》。



天蓝(左二)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同学合影

助理编辑。

延安时期

1938年，天蓝由一位八路军将军介绍，从山西赴延安，任延安军委总政治部通讯股股长、火线通讯社社长。7月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在鲁艺第二期(文学系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兼编译科科长，曾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立意创造无产阶级的美学体系，并拟就了《美学提纲》。他还组织了文学团体路社，编辑墙报《路》；在《抗战文艺》上发表长诗《队长骑马去了》，反映抗战军民生活。这一年天蓝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主办部队文艺青年训练班，并为学员讲文学创作课。12月当选为延安新诗歌会执行委员，1941年12月当选为延安诗会理事，曾在延安《文艺战线》《文艺阵地》等刊物发表诗歌作品。1941年10月发表长诗《我，延安市桥儿沟区的公民》，曾与王震之、冼星海等创作歌剧《军民进行曲》及歌曲《九一八合唱》《开荒》等，1942年出版诗集《预言》。1942年5月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当时为鲁艺文学系编译科科长、文学系党支部书记。1944年同吕骥、艾青、贺绿汀等人到南泥湾体验生活并作部队文艺活动调查。1945年3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在三五九旅作部队文艺调查的报

告《部队文艺一览》。

离开延安后

1945年，抗战胜利后，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天蓝作为赴东北干部大队领导人之一率队前往，主编《工人日报》、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曾任黑龙江勃利土改工作团团长。1947年任东北《北满日报》主编，在《新华日报》《东北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大量文章。1949年任东北煤矿总工会副主席，1952年调中央高级党校，任语文教研室主任，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4年出版《队长骑马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像太阳般升起》等诗集。1956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任职，专注于校注马克思著作，出版《(资本论)浅释》，并发表报告文学、散文等作品。1966年“文革”中被下放到保德县山村务农。1978年获得平反，调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任负责人，从事文学、美学等学科研究和翻译工作。1981年调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出版《天蓝诗选》。

1984年4月13日，天蓝于北京逝世。(延安精神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慧琳)

在新赶考路上奋楫笃行

(上接第一版)

早年间，苏忠宁外出打工，辛辛苦苦闯荡一年，才挣个三五万元。2017年，看到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的大力支持，他决定返乡创业。“经过精准扶贫，又赶上乡村振兴，国家对农村产业政策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正是青年人返乡创业的好机会。”他高兴地说，“返乡后发展樱桃产业，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还鼓励他注册了公司。现在50亩樱桃园，今年预计挂果800余株，一年收入便可达40余万元。”

小山村迎来“兴农人”

在安塞区镰刀湾镇罗居村，提起“养鹿人”赵洋洋，村民们都赞不绝口。

“他脑子活、有闯劲，敢做别人想做又不敢做的事。”

“他不仅自己脱了贫，还带领乡亲们走上了致富路。”

“入股我们合作社的村民，每户每年能分红1200元。”赵洋洋感慨万千，“过去大家帮我，现在我帮大家。我们齐心协力，振兴就有后劲！”

这位被交口称赞的好后生，靠养梅花鹿，不仅脱了贫，购房买车、结婚生子，而且还带动14户人养了鹿。

赵洋洋还走出延安，与陕南佛坪县合作建立养殖基地，力争让更多的群众参与进来，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如火如荼，“兴农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走进吴起县吴仓堡镇吴仓堡村老谷生态农业庄园，远处的山上草绿树青，近处库坝里连片的网箱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鱼儿不时跃出水面，农户谷佩正忙着投饵喂食，悠闲自在的鱼儿游来游去，一派和谐的田园景象。

谷佩是吴仓堡村村民，2019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奔波，收入很不稳定。今年，借助吴起县惠农政策，谷佩毅然返乡创业。“今年的鱼苗长势很不错，目前投放了3万尾

鱼，估计秋季产量能达到5万公斤，根据现在生态鱼的市场价格，这将是笔很不错的收入。”谷佩高兴地说。

敢想更敢做。告别贫困后，一批批“兴农人”怀揣着新时代的梦想，在黄土地上“大展拳脚”。

1990年出生的王国志是个“棚二代”。

“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环境的持续改善，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人回到了农村，从父辈手中接过种‘大棚’的接力棒，用勤劳、智慧和科技手段种‘大棚’，当起新型农民。”王国志说。

走出校园后，王国志一直在外打工谋生，不仅收入不稳定，还顾不上家里。而他的“棚二代”父亲、西洼界村大棚种植“老手”王占祥，却把种“大棚”的事业越干越顺手，收入越来越高，日子越过越美。

2021年，王国志回村。一家人拿出全部积蓄，在西洼界村投资120多万元，流转土地80余亩，建起17座新型日光温室大棚，集中精力发展大棚种植产业。

“有这么好的政策扶持，我一定得把种大棚这份事业干好了，把‘棚二代’这个身份守牢了。”王国志从打工仔变成了大棚蔬果种植大户。作为职业农民，他谋划得更加长远，决心在黄土地上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绿色创业之路。

2021年，延安新选派第一书记949名、驻村工作队878支、驻村工作队员1837名。他们接下乡村振兴的“接力棒”，向着“春天”再出发。

“既然来到村上，我就要多给村里做事，多给村民解难。”2021年8月9日，刘友涛被派驻到宝塔区青化砭镇林坪村担任第一书记。

几个月下来，林坪村的鱼池投产了，百吨冷库用上了，红白理事会筹建中、积极向煤泥综合利用产业链输送村上剩余劳动力……村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踏实、越来越开心，刘友涛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大家

长”。

脱贫群众、返乡青年、帮扶干部……他们一头扎进“泥土”里，为乡村注入生机与活力，一座座村庄开始新的“拔节”。

沃野田园“风光好”

走进吴起县庙沟镇楼坊掌村，一座座院落干净整洁，围墙上的壁画，勾勒出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来到村民齐进前的院子，整间小院儿被收拾得是干干净净，房屋窗明几净……齐进前的家被评为“美丽庭院示范点”。

说起村上以前的模样，齐进前连连摇头：“以前住的窑洞上面是石棉瓦顶，只要下雨，窑背就会漏水。现在装的是彩钢皮，这个好，下不来水了，比较安全。”

“我们家原来是土院，只要一下雨，路上泥的走不成，一踩一个坑。”77岁的老奶奶许润英乐呵呵地说，“现在无论走哪里，大路下去都是好路，没有泥路了，待在家里可高兴了，孩子想叫我去县城里住我也不去，这农村多好。”

黄土地上的小村庄，不仅“颜值”蹭蹭涨，“内涵”更是丰富。

小吃香味四溢、萌宠憨态可掬、娱乐新奇有趣，风铃转啊转，醉心于花的海洋……

“五一”假期，在安塞区高桥镇南沟生态示范园内，游客们或带着孩子玩射击、坐马车，或陪着父母赏花看萌宠，又或者情侣徜徉花海中拍照留念……熙熙攘攘，好不惬意。

获评3A级景区，成立现代农业示范园，集体经济产值达257万元……走进南沟村村史馆，一条条大事记，一张张照片……深情讲述着这个昔日“烂杆村”的蝶变之路。

山还是那座山，但南沟村却已发生巨变。近年来，按照“企业+贫困户”的方式，南沟村推行资源变资产、群众变股东、农民变工人的“三变”和“一养老”扶贫模式，让曾经那

个清冷的贫困村，成为眼前热门的乡村旅游风景区。

如今，在南沟村，除了户均10亩的果树产业外，人人是股东，每户至少入股一个合作社，有的人入股三个合作社；人人是产业工人，在园区务工或者围绕园区办农家乐、开小卖部等，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美丽乡村的画卷在山塬沟涧间缓缓铺展，“面子”亮，“里子”实。

“京兆村，聚福地，村规民约新风气。价值观，要牢记，爱党爱国志不移……”在洛川县京兆村，由“五老”志愿服务队制定的《京兆村村规民约》快板传唱极高，尊老、爱老、敬老的良好风尚在乡村蔚然成风。

“听说今天村上夜校有课哩。”“走，咱们一起听课去。”

延长县七里村街道管村农民夜校灯火通明，众多村民在吃完晚饭后，纷纷来到这里，认真学习农业政策知识。

课上，来自延安市的专家对中央一号文件、乡村振兴等方面的政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并就如何做好春季田间管理，特别是苹果冻害预防、补救及苹果花期管理技术要点进行了培训。

“讲得生动，有针对性。”课堂结束后，村民王柏林说，以后夜校开课我还要来，不仅能了解到许多党的好政策，而且能学到一些实用技术。

管村第一书记王伟说，举办这样的宣讲培训，就是为了打造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让他们在乡村振兴道路上底气更足，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满天的黄沙难得见，沟岔绿成一片，青山绿水鲜花艳，高原美景似江南……”唱着新时代“信天游”，沐浴在宝塔山下别样的“春天”里，新时代的延安人，在党的好政策感召下，正步履铿锵，向着美好生活阔步前行。

三星堆背后的古蜀文明

朱章义 郑漫丽 田湘萍

1929年，当一批玉石器从四川广汉流出，人们就开始孜孜不倦地探索四川古代文明。经过几代考古人不懈的努力，很多重要遗址被发现，大量珍贵文物出土，诗仙李白感叹的“开国何茫然”的古代蜀国历史正逐渐清晰。

目前，考古学家们已基本厘清了古蜀文明的演进脉络，即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到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再到以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金沙十二桥文化，最后到成都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为代表的战国青铜文化，直至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众多的考古发现向我们展现岫岩繁星、明如皓月的古蜀文明。

宝墩文化时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探寻三星堆文化的源流，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和紫竹、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大邑高山等8座史前古城遗址。这些古城都有高大的城墙，有的还有大型建筑基址，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也有极少量的玉器，制陶业发达，陶器组合为绳纹花边陶、敞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宽沿平地尊等。因宝墩遗址最具代表性，故其统一命名为“宝墩文化”。宝墩文化尚处于文明孕育时期，也可以说是文明的曙光。三星堆遗址也发现了大量与宝墩文化特征相同的器物，有的专家认为宝墩文化孕育了辉煌的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时期

三星堆文化距今约3700—3200年，是古蜀文明的第一个高峰。除了金器、铜器、玉器、象牙外，该时期仍使用石器。陶器以小平底罐、鸟头把勺、高柄瓦为组合。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在三星堆发现的8个坑都属于三星堆文化较晚时期，年代距今3200—3000年。

依据一、二号坑的考古发掘报告，两坑共出土文物1700余件，除去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黄金面具、青铜人头像等造型奇特的文物以外，大多数出土物与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出土同类器物相同或相似，比如青铜容器的尊、罍，玉器中的璋、戈、璧等玉礼器，斧、铈、凿等玉质工具。可以说，三星堆文明是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之上，融合了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文化，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支独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在这一文化之中，宗教祭祀活动占有重要地位。

金沙文化时期

在距今约3000年，三星堆被逐渐废弃，成为一般的聚落遗址。古蜀文明的中心转移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地，从而进入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新的发展阶段——金沙文化时期，其年代约为距今3200—2600年。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城区发现抚琴小区、十二桥等数十个晚商到西周时期的遗址，它们与金沙遗址、羊子山土台遗址又一起辉煌。在这些遗址中，金沙遗址面积最大、出土文物级别最高，成为这些遗址的中心，为继三星堆之后的又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考古工作者在金沙遗址发现大型宫殿基址、大型墓地、专用祭祀区等，陶器组合有小平底罐、圈足罐、尖底杯、尖底盏等。同时，在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了大量与三星堆祭祀坑相似甚至相同的文物，除了大型特殊青铜器以外，其他器物如玉器、石器、金器几乎完

全相同。比如，三星堆金杖与金沙金冠带上的纹饰都是由人头、箭、鸟、鱼组成，两地发现的金面具、玉戈、玉璋、有领璧形器等文物在造型和风格上高度一致。

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有高度相似的器物群和埋藏方式，在宗教信仰、城址布局及时间延续上都可以看出金沙文化直接秉承了三星堆文化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精进。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古蜀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谜找到了有力的证据。

晚期蜀文化

大约在春秋中期(公元前600年左右)，金沙王国已渐趋衰微，其中心位置或已转移。随着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葬、新都马家墓、青白江双元村等一批战国时期墓葬的问世，人们见证了晚期蜀文化的再度辉煌。这一时期，发现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具有巴蜀地区共同特征的青铜兵器，这些青铜兵器以戈、剑、矛等器型为主，数量众多，类型繁多，多数兵器还铸有精美的纹饰以及难解的图案，为晚期蜀文化注入新的特点。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至西汉中期汉武帝时期，巴蜀文化最终融入汉文化中。

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将“宝墩文化”称为蜀文化的萌芽；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是早期蜀文化发展的两个高峰阶段，也称之为三星堆文化期、金沙十二桥文化期；而以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葬、新都马家墓、青白江双元村等为代表的战国时期墓葬则归于晚期蜀文化。这些古文化遗址如满天星斗，共同架构出古蜀文明雄浑壮阔的社会历史图景。

未解之谜

象牙具体作何用途?

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均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象牙及象牙制品等骨角牙器，有所不同的是，三星堆的象牙多数都经过火烧，而金沙遗址的象牙均未经火烧直接埋入土中。二者之间的差异可能反映出不同时期人们对象牙的使用目的有所不同。但具体为何种用途，尚无法知晓。

面具为何频繁出现?

三星堆和金沙都有面具发现，但从使用情况看，三星堆对面具的使用更为频繁和重视。面具在古蜀国祭祀中发挥多大的作用?仍需要更多研究。

青铜立人中空双手握着什么?

三星堆和金沙各发现了一大一一小青铜立人，他们都作同一种手势。这种相似性反映了两个遗址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或类似的宗教仪式规范，昭示了两个遗址间紧密的传承关系。但中空的双手究竟握着何物?抑或仅仅是一种仪式的状态?目前也是一大谜题。

古蜀文明是否有文字?

尽管我们在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上发现有明显的刻划符号，但也只是零星发现。而在金沙遗址，尽管有卜甲出土，却未曾发现明显符号刻划痕迹。因此，无论是三星堆遗址，还是金沙遗址，我们都还没有找到有文字的确切证据，古蜀文明是否已使用文字还有待更深入的发掘。

无论是三星堆遗址，还是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带给我们巨大的惊喜，足以让我们为古人的智慧惊叹，它也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谜团。相信随着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工作的开展，将有更多古蜀文明的蛛丝马迹一一展现，为我们冲破萦绕在古蜀文明面前的重重迷雾。(作者单位：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以前想也不敢想的生活，现在过上了!”

(上接第一版)果园是家里唯一的希望，为了管理好果园，他认真学习技术，只要有技术培训，都会及时报名参加。平时只要有时间，就到果园里摸索管理技术。借助政府的各项扶持政策，夫妻俩精心管护，获得了良好的收益。2019年，他还清了所有外债。“现在一年收入二三十万元，务果机械就有五台，2020年还给小儿子买了小汽车，今年的目标是给大儿子在县城买套房。”马九军

笑着说。“我这小康生活甜如蜜，打心眼里感谢党和政府呀。”说起小康生活，马九军感慨地说：“现在产业稳定，收入有保障，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坚持发展下去，日子会越来越美好!”

想出去看看

记者在村里采访时发现，整个村子道路平整、花红柳绿，走到哪里都是绿茵环绕。在距离马九军家不远

处的广场上，健身器材等休闲娱乐设施一应俱全，老人们坐在一起拉家常。马九军说，这几年村子通过环境整治，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环境越来越好，群众的素质也提高了，也更加注重追求精神生活，农闲时都会到广场锻炼。“尤其是夏天傍晚，广场上扭秧歌的、跳舞的，特别热闹。”马九军说着，脸上乐开了花。

生活水平提高了，必然就会有更高精神追求。提起以后的日子，马九

军说：“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农闲时间，我还打算带着家里人出去看看，休闲旅游，也享受一下外面的生活。”

马九军还告诉记者，他的大儿子是村里近几年培养出来的苹果技术员，平时给村民做苹果管理技术指导，他准备带着儿子走出去学习电商销售，让志丹的苹果也插上电商的“翅膀”。“我们也要紧跟时代发展，学做新农人，让咱山里的苹果产业发展壮大。”

延安日报拟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相关规定和《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我单位对拟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了严格审核，现将名单予以公示，欢迎广大读者监督。

拟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李欢 任琦 肖怡甜

公示时间:2022年5月7日至5月12日

监督举报电话:

陕西省委宣传部传媒监管处 029-85225382

延安融媒体中心 0911-8216298

延安融媒体中心

2022年5月7日